

【论 文】

俄罗斯族群复兴的推动者

——读丹尼尔·特瑞斯曼的

《俄罗斯的“族群复兴”：后共产主义秩序中地方领导人的分离行动主义》¹

孟红莉²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成了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它大致继承了苏联四分之三的国土以及一半的人口。与此同时，像苏联其他的后继国家一样，俄罗斯也是一个多族裔的国家，它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转型，更严重的挑战是如何应对这个多族裔实体中不断出现的“族群复兴”，国家中的多个命名民族群体（titular nationality）要求更多的自治权，甚至是完全的独立自主权。

是什么力量推动了俄罗斯国内自 1990 年开始的族群复兴？其中的关键性力量是什么？在俄罗斯的族群复兴和族群冲突中，有的族群地区是要求完全独立，而多数其他地区只是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寻求更多的自治权。为什么各个族群地区和族群共和国的要求有如此大的差异？对于这些很多学者都试图去解答的复杂问题，丹尼尔·特瑞斯曼以工具性制度主义的视角，研究了俄罗斯 32 个以族群名称定义的共和国、自治区、自治州当中领导人的分离行动主义(separatist activism)行为，认为“驱动族群民族主义需求增长的不仅仅是族群认同和运动的力量，也是对能够获得的利益的理性计算。”³

丹尼尔·特瑞斯曼（Daniel S. Treisman）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教授，他的研究关注点集中在俄罗斯的政治和政治经济。他先后出版的专著主要是研究有关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地区危机和政治稳固性、地方预算等等，此外他还发表了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关的多篇学术论文。

本文评述的是丹尼尔·特瑞斯曼于 1997 年 1 月在《世界政治》第 49 卷第 2 期上发表的文章《俄罗斯的“族群复兴”：后共产主义秩序中地区领导人的分离行动主义》。在这篇文章当中，他通过构造一个衡量俄罗斯族群地区分离行动主义的指数并给各个族群地区赋值之后，运用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逐一分析了分离行动主义与行政地位、原生性族群变量、现代化的程度、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地方领导人的个人特征、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等因素的关系。不可否认，俄罗斯从 1990 年就开始的族群复兴也是苏联民族理论、民族制度的遗产，俄罗斯不得不继承由苏联的族群联邦政治模式所形成的一套特殊制度。丹尼尔·特瑞斯曼运用一种工具性逻辑试图来解释，在俄罗斯的后共产主义秩序中，族群形式的动员能够给族群地区带来好处。他得出结论认为，正是族群地区的领导人对各种利益的理性计算推动了俄罗斯各族群地区的族群复兴运动，并且他们沿着一个分离行动主义谱系做出程度不同的分离主义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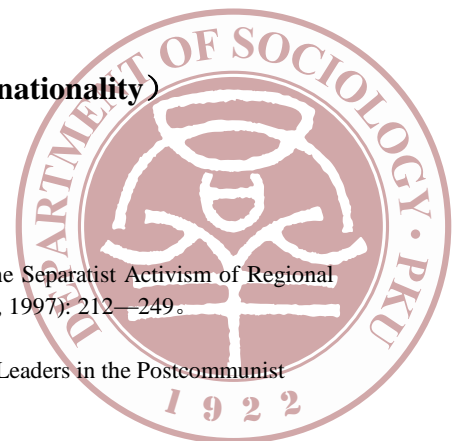
一、俄罗斯的族群构成和命名民族群体（titular nationality）

1、俄罗斯的族群构成

¹ 原文为英文，作者 Daniel S. Treisman，标题是 Russia's "Ethnic Revival": the Separatist Activism of Regional Leaders in the Postcommunist Order，刊于 *World Politics*，Vol.49, No.2 (January, 1997): 212—249。

² 孟红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³ Daniel S. Treisman, Russia's "Ethnic Revival": the Separatist Activism of Regional Leaders in the Postcommunist



俄罗斯是一个族群异质性的国家，全国有100多个族群。俄罗斯族是主体族群，2002年时有1.15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9.83%。¹占人口总数20%左右的其他族群大致可以分成如下七类：北方土著人民、高加索人民、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各族、欧洲的移民群体、来自亚洲的族群、其他群体、宗教方面的少数者等七类。其中，北方土著人民是指俄罗斯北部及西伯利亚地区的26个土著人群体，各群体人数很少但分布很广；高加索人民是分布在俄罗斯西南部高加索山脉地区的土著人群；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各族主要有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来自亚洲的人主要有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鞑靼人、阿勒泰人等；其他群体主要是指在苏联时代占据一定地区并实行“自治”的一些族群，包括楚瓦什人、乌德穆尔特人、巴什基尔人、马里人、科米人等等²。从人数上来看，人口超过100万的族群有6个，他们是鞑靼人、乌克兰人、巴什基尔人、楚瓦什人、车臣人和亚美尼亚人；人口在50万-100万的族群有11个，人口在1万-50万的族群有43个。³

2、命名民族群体 (titular nationality)

在研究俄罗斯族群问题的时候，常常会遇到“titular nationality”这个词，这里我暂将它翻译为“命名民族群体”，是指其族群名称也被用来对国家的某些行政管理区域进行命名的族群，他们有以自己的族称命名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或者自治地区，例如：鞑靼人、巴什基尔人、楚瓦什人、图瓦人等等。这里的“nationality”把它译成“民族群体”，而没有译成“民族”，其原因在于把它和“民族”(nation)经常所指向的“民族-国家”区别开来，想要强调的是它的族群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就是“以族群名称定义 (ethnically defined) 的行政区域”，指的是以某一族群名称来命名的共和国、自治地方或者自治州。实际上，这些自治行政地区虽然以该“命名民族群体”的名称来命名，却并不是完全的自治地区，还是要受到来自俄罗斯中央的程度不同的管理和控制。这样的命名方法也是苏联的遗产，它是苏联在进行联邦制建国时的策略，随后苏联在各族群地区推行的“民族化”政策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行政管理体制。

在俄罗斯的 89 个联邦主体中 (1996 年)，有三分之一是以族群名称来定义的共和国、自治地区或者自治州。这些族群地方在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状况、族群人口构成等各方面的差异都很大。并且，相当多的有区域自治体的“命名民族群体”是居住在“自己的”共和国、自治地区、自治州之外。(参见表 1)

表 1 1989 年俄罗斯部分族群的情况⁴

| | 在俄罗斯联邦中的人数 | 在自治体中的人数 | 居住在自治体中的人数占该族群总人数 (俄罗斯内外) 的比例 (%) |
|--------|------------|----------|-----------------------------------|
| 鞑靼人 | 5522096 | 1765404 | 26.6 |
| 楚瓦什人 | 1773645 | 906922 | 49.2 |
| 巴什基尔人 | 1345273 | 863808 | 59.6 |
| 莫尔多瓦人 | 1072939 | 313420 | 27.2 |
| 车臣人 | 898999 | 734501 | 76.8 |
| 乌德穆尔特人 | 714833 | 496522 | 66.5 |
| 马里人 | 634698 | 324349 | 48.3 |
| 犹太人 | 536848 | 8887 | 0.6 |
| 布里亚特人 | 417425 | 341185 | 68.2 |
| 奥塞梯人 | 402275 | 334876 | 56.0 |
| 卡尔巴巴尔人 | 386055 | 363492 | 93.0 |
| 雅库特人 | 380242 | 365236 | 95.6 |

Order [J].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2 (January, 1997). P. 249.

¹ 颜俊，“俄罗斯人口结构研究”，《西北人口》2010 年第 1 期。

² [美]戴维·莱文森，《世界各国的族群》，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116-133。

³ 颜俊，“俄罗斯人口结构研究”，《西北人口》2010 年第 1 期。

⁴ [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506—507。



| | | | |
|-------|--------|--------|------|
| 科米人 | 336309 | 291542 | 84.6 |
| 印古什人 | 215068 | 163762 | 69.0 |
| 图瓦人 | 206160 | 198448 | 96.0 |
| 卡尔梅克人 | 165821 | 146316 | 84.2 |
| 卡拉恰伊人 | 150332 | 129449 | 83.0 |
| 卡累利阿人 | 124921 | 78928 | 60.3 |
| 阿迪格人 | 122908 | 95439 | 76.5 |
| 巴尔卡尔人 | 78341 | 70793 | 83.2 |
| 切尔克斯人 | 50764 | 40241 | 76.9 |
| 阿尔泰人 | 69409 | 59130 | 83.5 |
| 涅涅茨人 | 34190 | 29786 | 86.9 |
| 埃文基人 | 29901 | 3480 | 11.5 |
| 楚科奇人 | 15107 | 11914 | 78.5 |
| 科里亚克人 | 8942 | 6572 | 71.1 |
| 曼西人 | 8279 | 6562 | 77.6 |

注：节选自瓦列里·季什科夫，2009：506—507页。

二、关注行动：测量族群地方领导人的分离行动主义

1、中央和地方的关键连接者：地方领导人

俄罗斯的族群复兴主要就是发生在这些族群共和国、自治地区和自治州内。丹尼尔·特瑞斯曼认为，在族群复兴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族群地区的领导人，“在很多国家（states），不管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族群是通过地方领导人和中央领导人的互动来参与政治的。在这样的情形中，地方领导人在两种政治场域中——当地和中央——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二者当中都要扮演角色并达成协议。通过分析‘嵌入’或者‘双边’博弈（the nested or two-level game）能够解释他们的选择，他们参与这样的博弈，在由地方全体居民的特征所决定的客观现实中与中央进行谈判。”¹

在俄罗斯，“所有的族群地区继承了通过当地立法机关选举出来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因此，就代表了中央的共产党（central communist party）和当地精英的选择。所有共和国当中有 11 个共和国在 1991 年至 1993 年间举行了选举，总统或者行政长官是通过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自治州和自治区的行政首脑由叶利钦任命，他们有时是从一个地方苏维埃所提供的的不长的候选者名单中产生。”²

不管地方领导人是如何产生的，族群地方的领导人扮演的角色总是多重的。首先，地方领导人是地方管理的最高首脑，是当地官僚机构的代言人，他所宣布的一些政策能够看做是当地全体居民所做出的决定，并且这些决定可能接着会被执行，例如宣称对本地的自然资源拥有支配权利、宣布拥有独立的外交权等等；其次，他可以看作是族群地方的代理人，能够代表整个族群地区来与中央打交道；再次，他又是介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他的行为既要受到族群地区的地方特点的限制，还要受到来自中央的管理和监督。地方领导人始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键连接者。

2、分离行动主义（separatist activism）

丹尼尔·特瑞斯曼在他这篇文章中所指的“分离主义”，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分离主义——从俄罗斯独立出来的分离主义，他把俄罗斯各个族群地方所提出的各种有关政治、经济、外交、军队等方面的要求都包括进了分离主义。他所说的“分离主义者”，指的是各个族群地区的领导人，既包括那些公开为本族群地区要求完全独立的领导人，也包括提出各种自治要求的领导人。实际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和中期，也就是 1990 年到 1995 年这段时间里，在俄罗斯那些以

¹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14-215.

²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23.



族群名义定义的行政区域中，真正公开宣布独立的只有车臣共和国和鞑靼斯坦共和国两个，它们要求从俄罗斯联邦中完全脱离出来。其他族群地方提出的要求更多的是要求自治、要求对本地的自然资源拥有支配权力、采用自己的宪法等等。

此外更重要的是，丹尼尔·特瑞斯曼提出了“分离行动主义”这个概念，他要表明的是他的研究方法是“研究行动而不是目标”，族群地方领导人的程度不同的分离行为都可以包括进一个“分离行动主义”谱系中。之所以提出上述的研究策略，是因为目标很难像行动那样能够被直接观察到，而且“历史提供了很多依赖于国家协商和当前前景的范例：以故意误导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要求，为了策略性原因而降低需求的群体，在自治和独立之间来回摇摆的要求等等。在谈判的过程中，不可谈判的经常变得能够谈判，反之亦然。因此，通过他们声称的目标对运动进行分类变得复杂，这是因为目标的策略性和弹性，也是因为实际上领导人的通常愿望被削减后也勉强接受了。根据他们所使用的策略，表面上的经济运动也不能从表面上的政治运动中区分出来。以经济目标开始的罢工经常变成政治性的。并且，正如地方领导人认识到的，纯粹以经济为目标的行动能够带来深远的政治结果，有时削弱了中央的权威而达到了革命和崩溃的程度。”¹

3、系统测量族群地方领导人分离行动主义的差异程度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衡量各个族群地区分离行动主义的差异程度呢？丹尼尔·特瑞斯曼精心选择了一些标志，很巧妙地构造了一个指标体系。这些标志包括政治-法律分离主义、经济需求等两个方面，都是1990年至1994年间发生的事情。具体是：

政治-法律分离主义标志有9个：

(1)、族群地区的政治领导人（既包括地区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包括总统）宣布自治

(2)、领导人单方面宣称地方具有更高的行政地位（例如，一个自治州宣称具有共和国的地位，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宣称具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位）

(3)、族群地区采用自己的宪法（constitution）

(4)、运用宪法或者其他一些法律文件宣布，地方的法律或宪法优先于联邦的法律或宪法

(5)、就地方独立问题在当地举行公民投票

(6)、对1993年12月举行的联邦选举进行地方上的联合抵制，导致投票人不到25%

(7)、不但宣称自治而且彻底独立，或者正式宣布本地区不再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8)、地方领导人拒绝再输送士兵到联邦军队的其他地方服务

(9)、宣称有权利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或者对外经济政策。

经济需求的标志有两个：

(1) 政治领导人宣称有控制自然资源的地方权力

(2) 宣布有意向发行地方货币。²

然后，对于以上总共11个标志给予同样的分值，每一个赋值1分，如果某一族群地区发生了上述行动就可以获得1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地方分离行动主义指数(index of regional separatist activism)，其最高分值可以达到11分，最低分值是0分。

运用从俄罗斯和西方的报纸、电视、广播，还有西方和俄罗斯地方专家的研究著作中所获得的信息，丹尼尔·特瑞斯曼计算了俄罗斯32个族群地区的分离行动主义指数。如果将它们分离行动主义程度分成非常高、高、居中、低、非常低这5个等级的话，分离行动主义程度最高的是鞑靼斯坦和车臣这两个共和国，分别是11分和10分；分离行动主义较高的有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萨哈共和国，分别是8分和7分；分离行动主义分值居中是布里亚特、卡累利阿、科米、卡尔梅克这几个共和国，得分是5分或者6分；印古什、马里埃尔、楚瓦什、卡巴尔达-巴尔卡

¹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24.

²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24-225.



尔、达吉斯坦、北奥塞梯、图瓦、乌德穆尔特这些共和国的分离行动主义分值比较低，得分是3或4；莫尔多瓦共和国、涅涅茨自治区、阿迪格自治州、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戈尔诺-阿尔泰、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科里亚克自治区、楚克奇自治区的分值是2分，还有汉特-曼西自治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泰梅尔自治区的分值仅为1分；落在最后的是乌斯季-奥尔达自治区、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犹太自治州、埃文基自治区，其分值是0分，也是说它们避免任何对抗，没有任何要求分离或自治的行动。

三、有待检验的研究假设：可能影响族群地方领导人分离行动主义的多种因素

为什么各个族群地方领导人的分离行动主义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丹尼尔·特瑞斯曼从族群的自我认同、动员、讨价还价能力、领导人特点这四个方面对有关理论一一进行了分析之后，提出了多个有待检验的研究假设。

1、族群的自我认同

对于族群认同的解释，原生论认为族群的情感纽带是“原生的”，族群的、文化的、语言的、宗教的共性提供和推动了将社会运动变得具体化的标志，它们能够超越时空而存在和自我激活。当试图去解释族群认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强度和范围时，现代化理论提供了三种解释：一是在寻求现代化的物质利益的过程中，能够作为族群认同基础的那些标志很容易促成集体行动；二是传统群体的领袖们利用族群运动来反击这种现代化对他们权威地位的威胁；三是现代化所导致的经济或者职业分化(cleavage)与先在的族群边界刚好一致，并且加强了族群边界。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的研究则认为最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存在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那些教育、职业、经济“落后”的群体当中。此外，族群认同还有可能被一些短期的、激烈的、暴力的事件政治化，例如族群冲突、大量移民、斯大林对某些族群的驱逐等等。

基于以上分析，丹尼尔·特瑞斯曼从族群认同的角度提出了如下的研究假设，认为：

“原生论的理论可能暗示那些在文化上和主要民族群体(central nationality)差异最大的群体会最强烈的分离主义领导人。这种文化上的疏离可以体现在语言使用的比例和宗教等方面。(例如，在俄罗斯，为了自治的目的，穆斯林民族群体(nationalities)、佛教民族群体、那些使用本族语的人口比例较高的民族群体可能要比正统基督教徒群体、语言同化程度较高的民族群体更快地被动员起来。)它也可能意味着领导人的分离行动主义将会随着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整个地区总人口的集中程度而发生变化。能够通过将族群标志政治化而被动员起来的联合体(coalition)越大和越强有力，政治企业家围绕着分离主义行动而进行活动的可能性越大。

现代化视角的不同看法提议的假设是：分离行动主义在下列情况中会更突出(1)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2)在最近迅速现代化的地方，(3)在为现代化的好处而进行斗争的相对先进群体中，(4)在落后地区的落后群体中，这些群体在现代化的国家中因为没有能力参与竞争而受到威胁。趋同的差异(convergent-cleavages)这种观点意味着最强烈的分离行动主义将是在族群身份和职业或经济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方。最后，冲突具有动员性的视角意味着分离行动主义在下列地方可能最剧烈：在那些最近发生了少数族群和多数族群之间暴力冲突的地方；在迁入的居民威胁了传统认同的地方；或者在压抑的痛苦难忘的事件仍然还保留在现存记忆中的地方，这催化族群不信任。”¹

2、动员：族群组织的存在

族群认同的文化、语言、宗教等各种因素一直是存在的，如果存在族群组织，它们就会利用这些标志来动员族群成员参与到各种族群行动中，这样可以给地方领导人施加压力，或者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也可能会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这样的理论观点形成的研

¹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19-220.



究假设就是：分离行动主义在族群组织存在并对当地领导人施加政治压力的地方将是最大的。¹

3、地方的独立性、讨价还价能力 (bargaining power)

丹尼尔·特瑞斯曼认为，由于在俄罗斯制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各族群地方与中央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与自治州、自治区相比，共和国在中央有更多的权利和更多的代表。而且，“制造忠于政党的本地精英的政策，在共和国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在其他地方更大，这些政策丰富了现任共和国领导人的经验，使他们有了更高的管理水平和更多的与中央讨价还价的制度资源。因此可以假定，由于拥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富于技巧的共和国领导人，共和国比制度上有较低地位的地区更有可能提出分离主义的要求。”²

讨价还价能力因素的第二个方面是“博弈的报偿”，而不是博弈的结构。“从自治中获得的预期利益越大，地区领导人追求风险的倾向愈大，那么一个地方进行分离主义行动的可能性也越大。”³从独立中获得的预期利益有多种，其中经济方面的是最容易测量的。因此，“可以设想，那些对其他地区贡献很大的地区或者那些为其他地区提供宝贵资源的地区，可能预期从分离中获得正面的收益。地区对中央在通讯、贸易、原材料、补贴等方面的依赖性越大，当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时就越脆弱。”⁴

4、领导人自身的特点

这里主要关注的是领导人自己特定的制度资源、利益和自我认同，提出的研究假设是：“那些在与中央的良好关系上进行投资而获得政治资本的领导人（例如，国家的党的成员 member of national party），可能不愿意去冒险失去或者降低这种政治资本。那些在个人上与中央的制度有更紧密联系的地区领导人（例如，作为国家议会的当选的代理人），寻求破裂的可能性更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在中央已经失去制度支持的地区领导人，可能会通过新的‘重新发现’的当地族群认同来寻求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此外，“可以预期那些由叶利钦任命的领导人所领导的族群地区要比那些由当地选举的总统所领导的地区更不会断言要实行分离主义。”⁵

以上这些研究假设都是根据族群研究的多种理论、对族群地区的很多实证研究所提出的，而且丹尼尔·特瑞斯曼也尽可能地将它们量化，以便能够用经验材料来进行检验。从这些数目繁多的研究假设来看，他是想将有可能影响到族群地方领导人分离行动主义的各种因素都尽力地罗列进来，其中有他所赞成的，也有他所质疑的。那么，这么多的影响因素当中哪些是能够解释俄罗斯族群地区的分离主义行动呢？

四、寻找关键因素：理性计算的族群地方领导人

1、交互分类表和相关系数分析筛选出与分离行动主义相关的因素

由于需要验证的研究假设很多，而研究个案的数目只有 32 个，丹尼尔·特瑞斯曼就先分析了各个原因变量和分离行动主义之间的相关系数和交互分类表，然后再用多元回归分析来进一步确认。

首先，在各个原因变量中，地方的行政地位 (administrative status) 这个因素几乎总是和分离行动主义程度密切联系在一起（参见表 2），自治区和自治州的分离主义程度要比共和国的小。“总体上来看，当自治区和自治州 (Aos) 限制他们自己宣布自治并且有时宣称更高行政地位的时候，共和国则进一步要求或者宣称更多的特权。初步证据强有力地表明：各个地区在俄罗斯宪法结构中的地位影响了它的分离主义倾向。我已经假定情况属实，因为更高的行政地位赋予了一

¹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21.

²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21.

³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22.

⁴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22.

⁵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22-223.



个地区在政府间的谈判机制当中能够有更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¹然后，为了避免这种强关系扭曲其他关系，丹尼尔·特瑞斯曼使用了如下步骤来对双变量关系的其他假设进行检验：不仅在所有族群地区当中，而且也在 1990 年的 16 个共和国当中检视是否存在这样的关系。

表 2 行政地位与分离行动主义 (1990)²

| 分离行动主义指数 | <中位数 (中位数=3) | ≥中位数 (中位数=3) |
|----------------|--|--|
| 1990 年的共和国 | 莫尔多瓦 | 卡累利阿、巴什科尔托斯坦、楚瓦什、图瓦、马里埃尔、卡尔梅克、萨哈、达吉斯坦、鞑靼斯坦、北奥塞梯、布里亚特、乌德穆尔特、车臣、印古什、科米、卡巴尔达-巴尔卡尔 |
| 1990 年的自治州或自治区 | 涅涅茨自治区、阿迪格、阿尔泰、卡拉恰伊-切尔克斯、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汉特-曼西自治区、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哈萨克斯坦、泰梅尔自治区、埃文基自治区、乌斯季-奥尔达自治区、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犹太自治州、科里亚克自治区、楚克奇自治区 | |

接着，丹尼尔·特瑞斯曼对有关原生性族群变量、现代化程度、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地理劣势、经济讨价还价能力、领导人特点这几个方面的近 30 个原因变量进行了检验。为了能够全面、简洁地对他的论述有整体性的认识，这里做了一张综合性的表格，将这些变量尽可能地包括在其中。(参见表 3)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研究假设中的多数都没有得到证实，得到证实的主要是有关地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假设。有些研究假设虽然在所有的 32 个共和国和自治区、自治州这个总体中得到了验证，但是如果仅分析 1990 年的 16 个共和国时，它们与分离行动主义的相关关系就消失了，这说明这些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行政地位的不同所导致的。所以，要确定某一变量和分离行动主义之间的相关关系时，一定是要在两种情况中这种相关关系都存在才可。

在原生性族群变量中，能够影响族群认同的族群人口比例、族群人口增长速度、本族语的使用情况、学习本族语的在校生人数等因素与分离行动主义都没有关系。命名民族群体在本国的聚居程度似乎和分离行动主义之间存在联系，但是实际上这可能是由于自治区和自治州中的命名民族群体的聚居程度比共和国当中的更低造成的。但是，宗教认同却与分离主义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传统上是穆斯林命名民族群体的共和国要比那些传统上是基督教、佛教、萨满教的共和国更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穆斯林地区的分离行动主义的均值是 5.5，而非穆斯林地区的是 2.5；1990 年时的各个共和国，穆斯林共和国的分离行动主义均值是 6.7，而相应的非穆斯林共和国是 4.2。三个最坚决的分离主义地区——鞑靼斯坦、车臣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是穆斯林地区（参见表 4）。³

分析结果还表明，各族群地区的分离行动主义和现代化趋势也没有关系，分离行动主义分值的高低和地区的城市化、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例、农业劳动者在劳动力中的比例、1990 年的平均工资等都没有关系（参见表 3）。对于究竟在什么样的地区会有最大的分离倾向这个问题，丹尼尔·特瑞斯曼根据城市化水平、工业产出、农业就业等指标将 32 个地区分类之后，发现先进地区的先进民族群体的平均分离主义分值比其他任何一类都高很多，而且，落后地区的先进民族群体的平均分也比先进地区的落后民族群体的平均分明显要高。

¹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29-230.

²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30.

³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32



表 3 分离行动主义和各种可能影响因素¹

| | | 分离行动主义指数 (所有的 32 个共和国 和自治区、自治州) | 分离行动主义指数 (1990 年的 16 个 共和国) |
|---------------------------|---|---------------------------------------|-----------------------------------|
| 原生性族群变量 (相关系数) | 命名民族群体的比例 | 0.45 (0.01) | -0.05 (0.86) |
| | 非俄罗斯人的比例 | 0.39 (0.03) | 0.03 (0.92) |
| | 1959-89 命名民族群体的增长速度 | 0.30 (0.10) | 0.19 (0.47) |
| | 1959-89 命名民族群体在地区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长 | 0.30 (0.10) | 0.20 (0.44) |
| | 使用族群语言的人口比例 | 0.29 (0.10) | 0.12 (0.66) |
| | 学习当地语言的在校生比例 | 0.14 (0.53) | 0.02 (0.93) |
| 现代化 (相关系数) | 地区人口的城市化比例 | 0.25 (0.18) | 0.11 (0.69) |
| | 命名民族群体在苏联农村中的比例 | -0.36 (0.05) | -0.01 (0.97) |
| | 中等教育人口的比例 | -0.18 (0.33) | 0.05 (0.86) |
| | 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 | -0.06 (0.74) | 0.09 (0.73) |
| | 1990 年的平均工资 | 0.25 (0.34) | 0.19 (0.52) |
| | 农业劳动力的比例 | n.a. | -0.18 (0.52) |
| 1981-90 年工业资本强度的变化 | -0.17 (0.36) | -0.02 (0.94) | |
| 民族主义运动组织 (相关系数) | 指数: 民族主义组织的建立时间 (或者可寻找到的第一次报道) (早出现的组织=低) | -0.57(0.00) | -0.18 (0.50) |
| 地方领导人的个人特征 (分离行动主义平均值) | 地方领导人在国家或者党组织中工作过 | 3.1 | 5.0 |
| | 地方领导人没有在国家或者党组织中工作过 | 3.7 | 5.2 |
| | 地方领导人是命名民族群体的成员 | 3.9 | 5.2 |
| | 地方领导人不是命名民族群体的成员 | 2.1 | 4.3 |
| | 地方领导人也是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 | 10.0** | 10.0* |
| | 地方领导人不是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 | 3.1** | 4.8* |
| | 地方领导人是叶利钦任命的 | 1.3** | 4.0 |
| | 地方领导人不是叶利钦任命的 | 4.5** | 5.1 |
| | 地方领导人是选举产生的 | 5.1** | 5.4 |
| 地方领导人不是选举产生的 | 1.6** | 3.7 | |
| 地理劣势 | 与莫斯科的距离 | n.a. | 0.11 (0.69) |
| | 在本地区之外的命名民族群体人数占总数的比例 | -0.28(0.13) | 0.11(0.69) |
| 经济还价能力 (相关系数) | 人口 | 0.73(0.00) | 0.61(0.01) |
| | 1993 年人均工业产值 | 0.06(0.75) | 0.58(0.02) |
| | 1992 年中央补助在地方政府开支中的比例 | -0.38 (0.04) | -0.42 (0.11) |
| | 1988 年工人人均出口额 | n.a. | 0.56(0.02) |
| | 在俄罗斯原材料总产值中所占百分比 | 0.61 (0.00) | 0.60(0.02) |

注: 圆括号中是显著性水平, 双边检验。

*均值的差异在 $p < 0.05$ 时显著, **均值差异在 $p < 0.01$ 时显著。

表 4 穆斯林传统和分离行动主义 (包括共和国、自治区、自治州)

| 分离行动主义指数 | 0—2 | 3—4 | 5—6 | 7—8 | 9—11 |
|----------|-----|-----|-----|-----|------|
| 穆斯林 | 2 | 3 | | 1 | 2 |
| 非穆斯林 | 14 | 5 | 4 | 1 | 0 |

族群冲突会加强族群认同并导致较大的分离主义这个假设也没有得到证实, 发生暴力冲突、与邻居发生领土争端、外来者的比例增加, 这些都没有增加族群地区的分离行动主义倾向。还有第二次世界被斯大林驱逐的五个民族群体 (卡拉柴人, 卡尔梅克人, 车臣人, 印古什人, 巴尔卡

¹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32-240



尔人)所在的共和国或者自治州,它们的分离行动主义平均值虽然略高,但是这种差异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民族主义组织已经存在的族群地区的分离主义更活跃(参见表3)。并且,在所有的32个族群地区中,民族主义民兵组织的存在和分离行动主义绝对相关。这表明,“在民族运动已经组织化并且非常激进的族群地区,民族主义组织会更有效把它们的要求强加给地区政治领导人,或者领导人可以把它们作为更可信的分裂威胁的借口并且用它们来和中央讨价还价。”¹

数据还显示,领导人自身的特定特征和既得利益并没有对分离行动主义起到作用(参见表3)。地方领导人是否在国家或党组织中工作过、是否是命名民族群体的成员等因素都不会导致更低或者更高的分离倾向。不是由叶利钦任命的或者是由选举产生的地方领导人有更高的分离倾向,但这是因为:来自莫斯科的任命都是发生在自治州和自治区内,所有的选举都发生在共和国内。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当地方领导人也是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时,其分离主义倾向很强烈。

地区在地理方面的独立性与族群地区分离行动主义也没有关系,有国际边界、功能性港口的地区、离莫斯科较远的地区、其他地区中命名民族群体的相对数量,这些都没有导致分离行动主义的差别(参见表3)。

分离行动主义与族群地区的经济前景、讨价还价能力有很强的关系。人口多、工业产值高的族群地区,工业出口多的族群地区,在俄罗斯原材料总产值中所占比例高的地区,分离主义更强烈。对中央补助依赖程度高的地区则趋向于更加谨慎(参见表3)。丹尼尔·特瑞斯曼据此认为,“理性计算这种要素始终存在于俄罗斯各地区的分离行动主义当中。”²

2、综合各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相关关系和交互分类表的分析之后,从多个原因变量中筛选出来的强关系变量所剩的个数并不多。为了进一步确认,丹尼尔·特瑞斯曼用假设的原因因素的各种子集对分离行动主义指数进行了OLS回归。双变量分析的主要结果在回归分析中都依然显著:地区行政地位仍然保持了根本的重要性;穆斯林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值要比非穆斯林地区更高;其他的原生性因素和现代化因素仍然不显著;依赖于中央补助的族群地区似乎有更小的分离主义倾向;工业产品的原料生产地区和出口地区平均更具有分离主义更倾向;在总统或议会主席也是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的两个地区——车臣和图瓦,有更强烈的分离主义。

3、解释:理性计算的族群地方领导人

通过对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离行动主义进行分析,可以来检验那些有关族群复兴、民族主义普遍理论的解释力和应用范围。族群原生论,现代化、移民移入、冲突会加强族群认同,领导人的个人特征、既得利益会影响分离主义等理论或观点都没有得到证实。丹尼尔·特瑞斯曼认为,在剔除了无关变量之后,剩下的行政地位、宗教、人均工业产值、原材料总产值等因素实际上都可以用工具理性来解释。

族群地区利用各种方式给中央施压,以便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那么,究竟是什么利益呢?其实对于大多数族群地区来讲,它们想要的并不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更确切地讲,参照点是更高程度上的自治——更低的中央税收、对自然资源的权利、更少限制的出口自由。能够从增加的自治中获得边际利益的族群地区最有可能要提出更广泛的要求。多数最坚定的分离主义地区的领导人想要的并不是真正的分离。”³

但是地区领导人发现,进行分离主义的各种行动是非常有效的,这能够促使中央作出很大让步并且能够索取到更多的财政利益。“尽管文化认同在俄罗斯的分离行动主义中也显然起了作用,但文化认同似乎是地区领导人的资源,而不是动员的力量。不管如何解释族群认同和族群组织的

¹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27.

²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39.

³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47.



影响程度，它们都被转化成地区的政治策略，其转化方式被当地领导人对地区利益的理性计算所高度建构。这样的领导人不是非理性的原生性冲动的政治体现，而是复杂嵌套博弈中的处于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经纪人，他们在博弈中要考虑更大自治的经济利益、中央财政报复的风险、激起本地族群冲突的风险、获得当地组织支持的需求等等。如果俄罗斯的族群是易爆发的，那么爆发是一种内燃机似的可以控制的爆发。内燃机就是利用一个内部约束系统，在司机所选择的方向上产生运动。”¹总之，丹尼尔·特瑞斯曼认为，20世纪90年代早期至中期，在俄罗斯这个后共产主义的多族群国家中发生的族群复兴是由俄罗斯族群地区的领导人所推动的，正是族群地区领导人对可获得利益的理性计算使他们有策略地选择了或大或小的分离行动主义。

4、简评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丹尼尔·特瑞斯曼这篇文章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在将抽象理论转化到具体研究假设的时候，在指标的选择上需要考虑多种因素，一个简单的比例有时并不能完全代表某个理论所要包含的内涵。例如，用使用本族群语言的比例来衡量某一族群与主体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这样就把问题过于简化了。某一族群的语言使用情况不仅受到各族群人数、比例、聚居情况的影响，还会受到族群情感、语言态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使用本族群的比例越低（或者说使用俄语的比例越高），有时候并不一定就表示这一族群与主体族群（俄罗斯族）的文化差异越小。其次，由于个案数量太少（总共32个），可能会导致有些统计结果的可靠性不高。

五、讨论：对中国族群研究的借鉴与思考

1、以族群地方的领导人等政治精英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视角

丹尼尔·特瑞斯曼关注到了俄罗斯族群复兴中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族群地方的领导人，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在族群研究中较少被注意到的研究视角。这种分析视角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分析视角，他把族群看成是精英和领袖们争夺权力的资源和工具，关注的是精英对大众的控制，认为精英是族群运动的主导。他用他的数据和分析方法基本上否定了族群“原生主义”的各种观点，从而支持了“工具主义”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当然，用一些具体的指标能否能够代表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文化概念，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商榷；而且说程度不同的分离行动主义是地方领导人的理性选择结果，这也简化了族群地方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复杂斗争和力量平衡问题。但是他确实向我们指出了，在俄罗斯后共产主义秩序中，需要特别关注地方领导人这样的政治精英对当地族群动员的巨大影响作用。

俄罗斯是苏联最大的继承者，在一定程度上它也不得不继承了苏联的多族裔特性和民族制度，它的很多族群地区更是直接来自于对原苏联自治地区的继承。“苏联解体而形成的所有那些国家，现在都处在‘民族构建’的道路上，……俄罗斯联邦从先前那些政体中，继承了与民族构建劳作相关的各种爱恨交织的情绪。”²苏联时代的民族构建政策不仅创造出了若干个以族群名义来命名的“民族自治行政区域”，而且还创建出了一种以“民族”身份为基础而形成的地方政治精英集团。在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的各级党政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中，干部的数量和比例都要依据当地的族群构成比例来进行配置。

作为整个自治地区的最高领导者，族群地方领导人可以看作是地方政治精英集团的领导者、协调者、监控者。当然，在各族群地区政治精英内部会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各族群自治地区也会有利益斗争和力量平衡问题，而且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分子等各个精英集团之间也会存在复杂的斗争。

地方领导人也是中央和族群地方之间的连接者。中央不可能直接面对地方上的某一族群的无

¹ Daniel S. Treisman, 1997: 248.

² [俄]瓦列里·季什科夫, 2009: 473.



数个体来进行管理，也很难直接与地方上的各种利益集团打交道，只能主要通过地方领导人来了解族群地方的情况，和这些代理人进行谈判、协商、合作。同理，族群地方也只能主要通过地方领导人来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个体利益的表达要通过地方的官僚行政管理体制来传递。这样的“中介人”的特殊身份使得地方领导人在整个国家管理体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作为中央和族群地方的连接者，地方领导人实际上是时刻处在中央和地方这两种政治场域中。在这两种政治场域中，他形成了自己特定的利益结构。对于族群地方，他要利用自己的制度资源、身份权利来对地方进行管理，协调各种利益集团，更好地控制地方；而面对中央政府，他要显示出自己对地方有良好的掌控力以便提高自己在中央的地位，同时，他还要表明他对地方拥有的动员性资源足以用来和中央进行讨价还价。

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深受苏联的影响。虽然就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方式而言，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苏联、俄罗斯的“联邦制”有一定的不同，但是就族群地方各族干部的产生和任用方式而言，中国和苏联却有很多的类似之处。根据国家的制度安排，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各级党组织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司法部门、学校教育等等部门系统当中，都会按照当地的族群构成情况来对各族干部进行配置。其中，很多少数民族干部都是在本族群的教育体系中接受各级教育。干部的产生方式多数是任命而非选举，主要领导干部都是由上级党政机关部门任命的。

族群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在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其发展战略思路、管理方式会对族群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重要的深远的影响。在族群地区，很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容易被激化成族群之间的矛盾，如果没有对当地族群问题的深刻准确把握以及一定的政治智慧，就很难处理好多族群共同居住地区的族群关系。在中国现行的党政管理体系中，由于各级官员的任免主要是由上级部门来决定的，这就导致了各级政府官员的行为是“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如果在上级的考核中制造“政绩”成为设计和实施各项工作的目标，而当地各族群众的呼声则通常被忽视。与此同时，各地区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往往也会形成以区域为边界的相对独立的利益需求，在向中央要政策、要资金的时候常会强调本地区的特殊性和利益。此外，各级行政管理体制，包括个体性的官员也会有自身的利益需求。因此，各级党政管理系统的领导人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有时是十分复杂和前后矛盾的。

长期以来，我们很缺乏对族群地方的政治精英（既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更包括汉族的）行为进行研究，甚至是由于各种原因主动回避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为了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长治久安，为了各族人民的利益，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回避中国目前在特定发展阶段所产生的现实存在的问题，忽视这些问题会使我们看不到一些族群问题之所以会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今后的族群研究中，我们应当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2、正确理解族群聚居区的地方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合理诉求

在多族群共同居住的国家，各个地区族群的利益诉求是非常多样化的。丹尼尔·特瑞斯曼注意到了在俄罗斯族群复兴的过程中，族群地方的要求异常广泛，从要求更多的经济自治、特殊待遇、宪法上的承认到完全的独立。但是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都会被中央政府理解成为“分离行为”。因此，他所构造的“分离行动主义谱系”是将族群地方的各种政治、经济、法律要求都包括了进来。他对“分离行动主义”所做的这种细分提醒我们要正确理解族群地方的各类利益诉求和政治上的“分离行动主义”，要仔细区分族群地方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不要轻易把部分人在政治、经济上的各类诉求视作要建立独立的国家。

中国目前这种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总体稳定的状态来之不易，我们应当时刻珍惜。但是也不可否认，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社会目前也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社会冲突也是不断出现。我们应当看到，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民众的个人生存和发展利益而展开的，这是民众为表达个人意愿、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寻求解决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方式。然而，有关部门却常常将这些矛盾和冲突在政治上“上纲”，将其视为危及社会稳定，甚至是危

及基本制度的问题，不恰当地将其政治化或者意识形态化。实践证明，这样的做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社会矛盾和冲突数量的不断增加。

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我们更要特别注意不要将一些问题扩大化，不要把少数民族正常的意见表达理解为对政权的威胁。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有1亿多，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面积约为中国领土总面积的64%。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不但存在着中国社会改革和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而且也存在着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民族政策执行所带来的问题。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一些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区环境恶劣、资源贫乏，其贫困问题、生存和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等各种因素的客观存在，也导致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各族民众都有以民生发展为中心的诉求。

此外，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政策，但是有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切实落实，有些政策并不完全适合当地的实际，需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愿望进行调整和修订。同时，有些干部存在着脱离群众、以权谋私的政治素质和工作作风问题，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少数民族的利益。以上种种，都涉及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意见表达问题。当某少数民族的个体或者群体提出了经济上、文化上的诉求时，千万不要把它简单理解成想要“分离”；当有些实际的民生问题得不到切实解决而导致部分人的过激行为时，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就是某一族群要搞民族分裂和独立。如果总是把少数民族群众正常的意见表达与“威胁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联系起来，那么很容易以“维护团结稳定”的名义采取高压政策，以此防止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这样做也许能在短期内实现社会的稳定，但却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矛盾，不利于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些需要及时解决的小问题就会在这样的研制下不断积累，最后被激化成更大的冲突。

3、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

丹尼尔·特瑞斯曼这篇文章是一篇典型和规范的定量研究论文。他首先提出了他关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俄罗斯的族群复兴？接着从族群的自我认同、现代化、族群动员、讨价还价能力、领导人特点等方面非常详尽地综述了有关的理论和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个研究假设。然后他精心选择了一些政治-法律指标和经济指标，设计构造了一个指标体系来系统地测量各族群地区的“分离行动主义”程度，并广泛地搜集数据。运用相关分析、交互分类表、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他分析了可能影响分离行动主义的各种因素，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是族群地方领导人对可获得利益的理性计算推动了俄罗斯各族群地区程度不同的族群复兴运动。这是经验研究论文的标准结构，包括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这八个组成部分，而且文中的各个部分之间能够做到各行其职，环环相扣，联系密切。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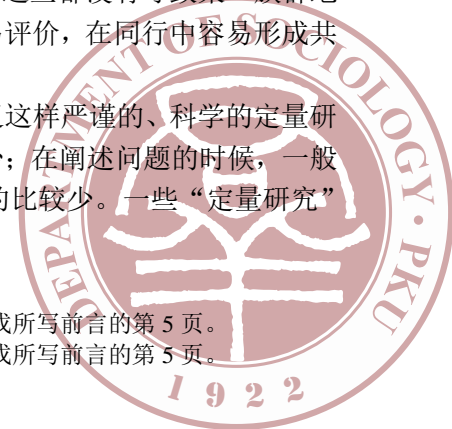
与定性研究相比，定量研究能够运用数据来对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分析，有助于克服研究者既有的价值倾向，来检验人们通常得到的“印象”是否真正符合客观事实²。例如，人们通常会认为族群地方领导人的立场会被他们自己特定的既得利益、个人历史、社会网络所影响，但是俄罗斯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个观点。不管他是否在国家党政机关工作过，不管他本身是否就是当地命名族群体的成员、不管他是由选举产生还是由叶利钦任命的，这些都没有导致某一族群地区有更大或者更小的分离行动主义。此外，定量研究的质量优劣容易评价，在同行中容易形成共识和相互交流。³

目前，在中国的族群研究中非常缺乏这样规范的研究设计，缺乏这样严谨的、科学的定量研究。我们的族群研究成果中，描述性的研究比较多，定量研究比较少；在阐述问题的时候，一般性的论述很多，能够运用有关理论来解释问题、能够提出自己观点的比较少。一些“定量研究”

¹ 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2）。

² 谢宇，《社会学与定量研究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马戎所写前言的第5页。

³ 谢宇，《社会学与定量研究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马戎所写前言的第5页。



论文存在不少问题：没有对调查方法的基本说明，也没有对数据来源进行明确的交代，调查研究缺乏科学的设计和执行；没有最基本的研究假设，只有数据的描述；有时有一定的数据，但多是对调查数据的描述，缺乏对数据的深入分析和各种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等等。

中国族群研究中定量研究比较缺乏是有原因的。长期以来，我们研究族群问题的学者主要是来自马列主义、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来自社会学领域的学者非常少，缺乏实证研究的传统和能力。从研究主题上来看，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族群发展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现实情况关注较少。从数据资料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正式统计资料中缺乏以族群为单位的社会与经济统计资料，由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的与族群相关的社会调查又非常少，这给进行定量研究分析增加了难度。尽管存在上述种种困难，但我们还是应该在族群研究领域加强定量研究，规范地开展相关的社会调查，以便能够了解族群地区的实际情况，为政府制定和修改民族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结 语

分析苏联民族政策的得失，分析解体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尤其是俄罗斯这个大国的族群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情况，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目前的族群研究、如何更好地处理中国自己的族群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看待来自多个学科的、多个视角的、多种方法的有关研究，借鉴其中那些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理论、观点、视角、方法等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由经济、文化、政策、资源等引发的族群问题会越来越多。我们需要做的是正视问题的存在，认识到少数民族的利益诉求实际上主要是围绕着民生发展、传统文化保护等问题而展开的。族群研究的学者们要深入地、规范地对族群问题的现状展开调查研究，分析族群问题产生的诸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提出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民族政策建议。

【论 文】

区隔化制度的失败和民族国家的胜利

——读《民族国家的胜利：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教训》¹

卢 露²

菲利普·罗德（Philip G. Roeder）在1991年发表的《苏维埃联邦政治与族群动员》（“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³一文中，提出“族群联邦主义”理论，以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对苏联解体进行分析。在该论文的基础上，他在这篇《民族国家的胜利：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教训》（“The Triumph of Nation-States: Lessons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¹ Philip G. Roeder, 2004, “The Triumph of Nation-States: Lessons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Yugoslavia, and Czechoslovakia”, in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eds.,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Comparative Lessons of Trans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1-57.

² 卢露，广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9届博士研究生。

³ 该文的汉文译本见《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61期（2010年2月）。

